



解读 《世代间对立》



世代之间的结构性错位，是自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以来逐渐形成的重要政治因素。它不仅动摇着自民党“一强独大”的格局，也左右着在野党之间的合作空间。作者指出，今后的日本政治必须以选民之间多层次的对立结构为前提来理解，因为一项政策往往可能通过复杂的政治路径，产生超出预期的政治后果。

图片：Kei / photolibrary

远藤晶久（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

自自由民主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¹曝光以来，经过两次国政选举——2024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与2025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日本政党政治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自公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利、少数执政政府的出现、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国民民主党的迅速崛起、参政党支持度急速扩大，以及日本维新会以“执政联盟伙伴”（阁外合作）的形式进入政权结构，政治局势的变化可谓接连不断。

自民党对政治资金丑闻的应对未能令选民信服，而持续的物价上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自民党因此逐渐被选民所疏远。在自公两党不仅在众议院、甚至在参议院也失去过半议席的情况下，时任首相石破茂仍表现出继续执政的姿态，由此引发更大的政治混乱。经过一番激烈纷争，自民党最终于2025年10月4日选出高市早苗为新任总裁。然而，在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之后，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形成新的“联盟关系”，并在10月21日勉强组建起新一届政府。

¹ 自民党派系的政治资金问题（即所谓的“黑金问题”）是在2023年11月下旬至12月期间被曝光，并迅速成为一项重大社会问题。

从在野党方面来看，尽管自民党在 2025 年参议院选举中失利，但立宪民主党并未明显扩大得票规模，作为在执政党失利选举中本应受益的最大在野党，其表现显得并不理想。与之相对，真正实现跃进的则是国民民主党与参政党。随着执政联盟结构的重组以及在野党力量版图的变化，未来日本政党对立格局的走向变得愈发难以预测。毫无疑问，这一系列政治变动的导火索正是自民党的“政治与金钱”问题，而政府在应对物价上涨方面的政策不满，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政治变化。如此看来，如果自民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公众信任，其政权是否会重新回到稳固状态——至少在外界看来是稳固的状态——仍然值得观察。

即便不考虑与维新会这一新伙伴进行选举合作的成败，也难以简单地认为局势会恢复原状。其原因在于，在当前政局动荡的背后，正逐渐显现出一种无法仅以传统“保守—自由派”²意识形态对立来解释的新的政治分裂结构。尤其是在不同年龄群体投票政党的差异中可以看到，不同世代对于政党对立的认知正在发生分化，而这种分化又与年轻人之间逐渐扩大的代际对立认知复杂交织。本文将以出口民调与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选民中的政党对立如何与世代问题相互关联。

从出口民调看政党对立的结构

根据 NHK、日本电视台与《读卖新闻》共同实施的 2025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出口民调结果，不同年龄层的投票政党差异十分明显（见表 1）。在 50 岁以上选民中，得票率最高的政党是自民党；而在 30 至 40 岁群体中，排名第一的是参政党；在 18 至 29 岁群体中，则是国民民主党（不过参政党的支持率也十分接近）。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年龄层的主要投票政党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观察得票率第一与第二名政党的组合，则又呈现出另一种结构。60 岁以上选民的主要竞争格局是自民党与立宪民主党；而在 40 至 50 岁群体中，则转变为自民党与参政党的竞争；到了 30 岁以下年轻群体，则变为国民民主党与参政党之间的竞争。在 30 岁以下选民中，自民党的得票率已经仅排在第三位。

表 1 出口民调得票率（前三位政党），按年龄划分

年龄层	第1位	得票率	第2位	得票率(%)	第3位	得票率(%)	有效政党数
18·19岁	国民民主党	23.4	参政党	23.2	自民党	13.4	6.8
20多岁	国民民主党	24.7	参政党	24.2	自民党	11.3	6.6
30多岁	参政党	23.2	国民民主党	18.7	自民党	12.6	7.7
40多岁	参政党	18.7	自民党	16.1	国民民主党	14.2	8.6
50多岁	自民党	20.6	参政党	15.3	立宪民主党	11.8	8.5
60多岁	自民党	26.3	立宪民主党	15.8	参政党	11.6	7.4
70岁以上	自民党	36.9	立宪民主党	19.9	公明党	8.7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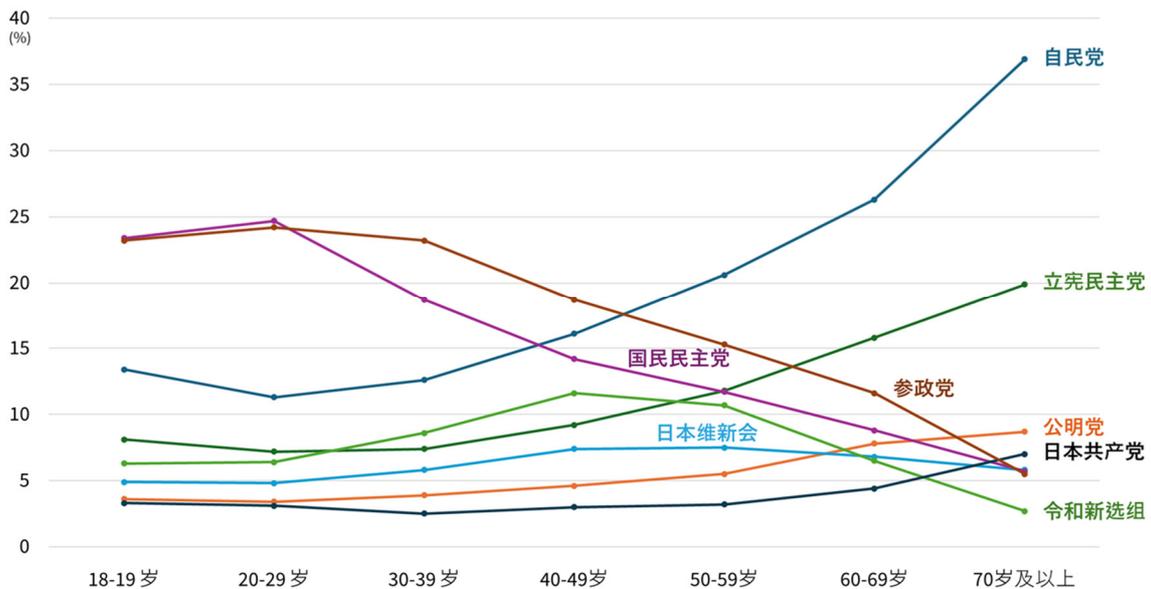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zero 选举全国出口民调 <https://www.ntv.co.jp/election2025/exitpoll/all.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2 月 4 日）

² 在日本，“自由派”一词通常指既非保守、也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力量或知识群体。这一群体一般主张战后形成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并强调性别平等与社会福利等理念。

表 1 中出现的政党包括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公明党、国民民主党以及参政党五个政党，但在所有年龄层中都出现的只有自民党。作为执政第一大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属理所当然。不过，尽管自民党在所有世代中仍然是政党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但在 30 岁以下人群中，其存在感明显较弱。

图 1 则将各政党的得票率按照年龄加以图示，其中不仅包括排名前三的政党，也纳入了其他政党的得票情况。从整体得票模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高龄层得票集中型：在高龄群体中得票率较高，而随着年龄下降得票率逐渐降低。这一模式在自民党和立宪民主党中尤为明显，虽然程度较弱，但公明党与共产党也基本符合这一模式。第二种则恰好相反，是年轻层得票集中型：在年轻群体中得票率较高，而随着年龄增长得票率逐渐下降。这一模式主要出现在国民民主党与参政党。第三种模式是中年层得票集中型：在年轻群体和高龄群体中的得票率都较低，但在 40 至 50 岁群体中相对较高。令和新选组最为典型，而日本维新会也呈现出类似趋势。

图 1 出口民调中各年龄层的得票率



数据来源: zero 选举全国出口民调 <https://www.ntv.co.jp/election2025/exitpoll/all.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5 年 12 月 4 日)

这一出口民调结果所揭示的是：在高龄群体中，依然存在与传统保守—自由派对立结构相重合的政党竞争格局，即自民党对立宪民主党的对立关系。相对而言，在年轻群体中，得票竞争的主要格局则变为国民民主党与参政党之间的竞争，这两者都试图与既有政党体系保持一定距离，而自民党则在其后紧追不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保守—自由派对立结构已经不再与得票模式直接对应。这种高龄层与年轻层之间的政党竞争结构差异，随着年龄的上升或下降而逐渐减弱，并在 40 至 50 岁的中年群体中相互交织。在这一年龄层中，自民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以及立宪民主党等多党并存，呈现出一种多方竞争的格局。

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有效政党数这一指标得到确认。所谓“有效政党数”，是用来判断一个国家政治竞争格局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以及在多党制条件下究竟应当将多少政党视为具有实际影响力的政

党（排除小党数量影响）的指标。该指标通常依据得票率或议席率计算。本文则使用出口民调中比例代表部分的得票率，计算不同年龄群体的有效政党数³。结果显示，年轻群体与高龄群体的有效政党数较少，而40岁与50岁群体的数值则明显较高（见表1）。在40岁与50岁群体中，有效政党数分别为8.6和8.5，这意味着在选举中，大约八至九个政党都可以成为这一年龄层选民的现实选择。相比之下，在18至19岁（6.8）与20多岁（6.6）的群体中，实际选择的政党数量不足七个；而在70岁以上群体中，有效政党数为5.0，意味着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政党大约只有五个。由此可以认为，由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公明党、共产党等构成的传统政党竞争结构在高龄群体中依然稳固；但随着年龄下降，由于更多政党的进入，整体呈现出多党化趋势。到了年轻群体，由于左派自由主义政党的存在感明显减弱，从而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结构的政党竞争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出口民调并非以严格代表选民整体为目标的样本调查，而主要用于选举当日的结果预测，因此其分析结果未必完全等同于选民整体结构，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不过，笔者参与的《读卖新闻》与早稻田大学联合实施的舆论调查（2025年9月至10月进行，采用更具代表性的概率抽样邮寄调查）虽然在个别结果上有所差异——例如40岁群体得票率第一为自民党20.1%，第二为国民民主党16.1%——但整体仍呈现出类似的模式，这一点亦值得补充说明。

“年轻人右倾化”论：其后的发展

上述讨论不禁令人想起2010年代初期关于“年轻人右倾化”的论调。所谓“年轻人右倾化”，主要依据是在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时期（2012年12月至2020年9月），年轻群体对自民党的得票率高于其他年龄层。然而，这一论点的核心在于强调“年轻人作出了不同于其他世代的投票选择”。从这一意义上看，如今年轻人投票给国民民主党或参政党的现象，也可以被置于类似的框架中进行讨论。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在当前的30岁群体（十年前的20多岁人群）中，自民党的得票率并不特别高，反而明显低于高龄群体。换言之，年轻群体并不像“年轻人右倾化”论所假定的那样，是自民党的稳定支持基础。进一步而言，年轻群体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去意识形态化”趋势，并且与其他国家类似，逐渐形成更加自由主义取向的价值观（Jou、远藤、竹中 2018）。

事实上，“年轻人右倾化”这一论断在学术界也早已受到质疑（远藤与Jou 2019；小熊、樋口编 2020）。笔者自己的研究曾指出：从得票率来看，年轻人投票给自民党的比例确实可能较高；但从支持率来看，年轻人对自民党的支持率却低于其他世代，因此以此断言“年轻人右倾化”的论据并不充分。另一方面，年轻人对民主党及其继承政党的支持明显低于其他世代。因此，在政党支持结构上，年轻人的选择并非“自民党—在野党—无党派”的三分结构，而更接近于“自民党—无党派”的二分结构。

然而，当年轻选民走进投票站时，如果感觉在野党缺乏有吸引力的选择，最终往往仍会投票给自民党。这正是年轻人并不真正支持自民党，却在选举中投票给自民党的机制。换言之，这是在左派自

³ 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将各政党的得票率分别平方后求和，并以该数值的倒数作为指标。

由主义力量迅速衰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社会学家小熊英二因此将其概括为一种“左翼缺席的两极化”（小熊、樋口编 2020）。

从这一脉络来看，当前年轻群体中的政党竞争依然存在“左翼缺席”的情况（见图1）。不过，与过去不同的是，安倍时期的自民党曾是年轻群体唯一的重要选择，而如今却被国民民主党与参政党所取代。整体结构或许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其中的关键政治行动者已经发生了改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背景促使自民党逐渐退居次要位置，而国民民主党与参政党得以成为新的选择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安倍政权所具有的“改革形象”并未被其后的三届内阁（菅、岸田、石破）继承。笔者的研究曾指出，年轻群体在评价政党时，并不主要依据保守—自由派这样的意识形态轴，而更可能依据“改革取向”的强弱来判断政党差异（远藤与 Jou 2019）。第二次安倍内阁通过“安倍经济学”塑造了经济好转的印象，从而获得支持，并以这一经济绩效评价为杠杆推进多项政策改革。

从这一意义上看，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丑闻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它暴露出自民党仍然固守旧式派阀政治的形象，成为削弱其支持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空隙中，国民民主党与参政党得以乘势而起，通过具体政策主张成功进入“改革取向政党”的位置。此外，日本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排外主义思潮在国政层面一直缺乏明确的政党代表，而在 2025 年参议院选举中，参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思潮的承载者。不过，这或许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对减税与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的期待，也可能是这些政党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高市内阁当前的高支持率——尤其是来自年轻群体的压倒性支持——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对其作为安倍路线继承者继续推进“改革”的期待。未来能否维持这一支持率，其关键恐怕仍然在于，像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一样，经济政策及其实际成果。

社会对立认知的代际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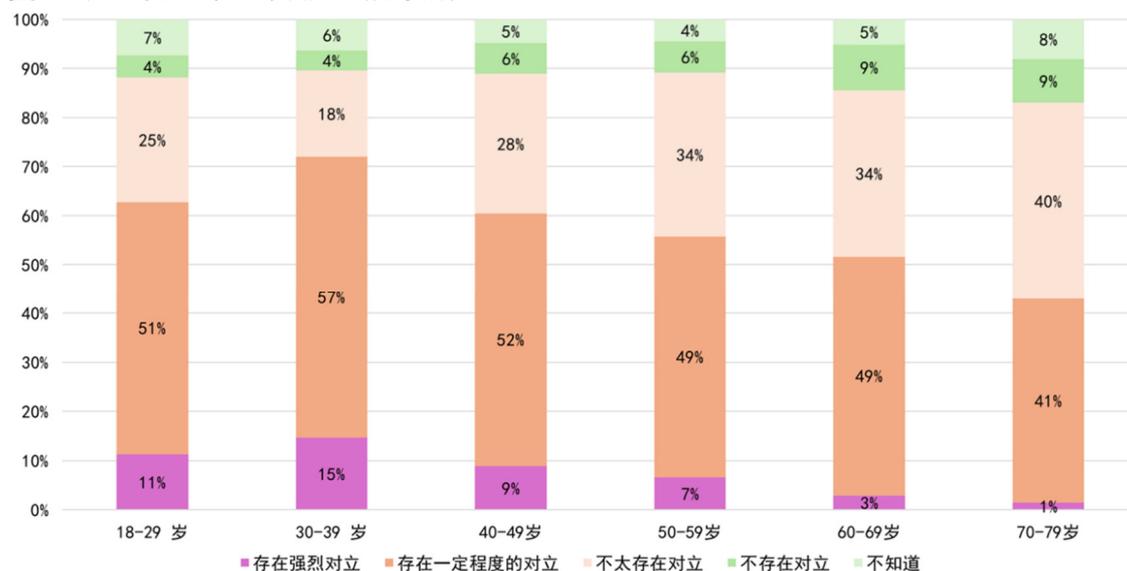
成功吸引选民支持的国民民主党与参政党，在选举中都将“现役世代”作为主要目标群体展开竞选活动。尤其是国民民主党的主张，强调通过增加（工资）到手收入来改善民众生活，其具体政策包括重新审视税负结构，并减轻现役世代的社会保险费负担。与依赖社会保障制度维持生活的高龄群体不同，这一主张强调应当更加重视承担纳税义务的现役世代，并通过降低其负担来改善社会分配结构。

在这一政治主张的背后，是对日本快速推进的少子高龄化所带来的严峻社会问题的危机感。同时，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现役世代对于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中财政负担结构失衡及其可持续性的担忧。虽然这种危机感与担忧往往被描绘为一种代际对立结构，但事实上，不同世代对于这一对立结构本身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

在此，笔者将介绍一项包含多种社会对立议题的舆论调查。虽然该调查是在参议院选举之前实施的，但其结果仍具有参考价值。2025 年 1 月至 3 月实施的“SmartNews 媒体价值观全国调查 2025”（SMPP2025 调查），设置了关于社会中六种对立关系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是否认为这些对立“存在

强烈对立”。从整体样本来看，在六种社会对立中，认知程度最高的是劳资对立（“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其次是经济对立（“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对立”）。劳资对立与经济对立位居前列这一结果，在 1990 年代的相关调查中也已经得到确认，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第三位是意识形态对立（“政治上保守者与自由派之间的对立”）。第四位则是代际对立（“现役世代与高龄者之间的对立”）与性别对立（“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两者并列。六种对立中，认知程度最低的是城乡对立（“城市居民与地方居民之间的对立”）。

图2 关于代际对立的认知（按年龄分组）



数据来源：SMPP 调查，20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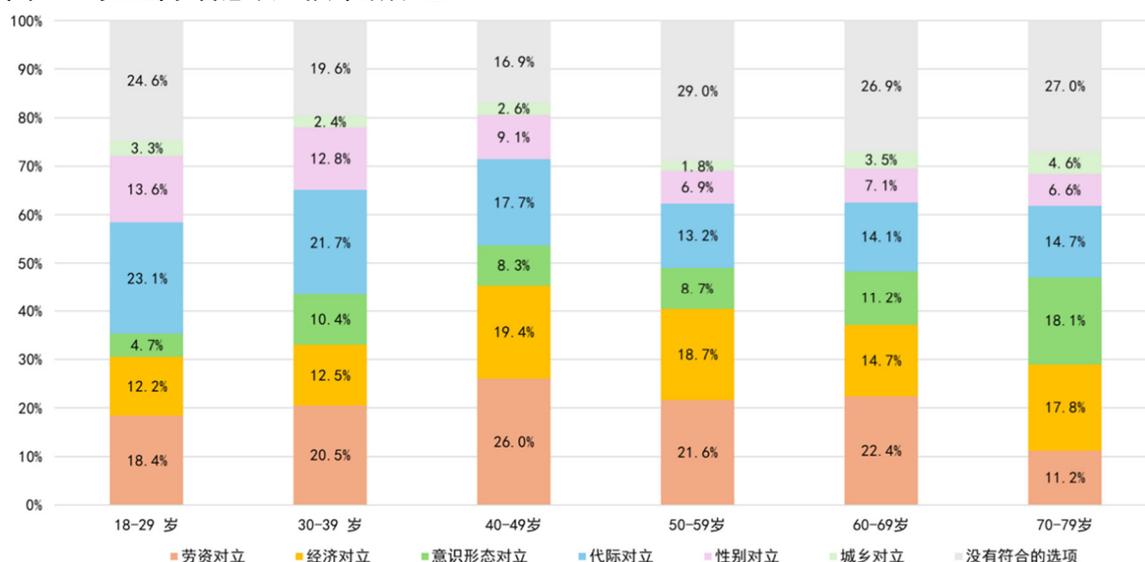
然而，如果单独观察代际对立的认知情况，并按年龄层分析回答分布，就可以发现：对于年轻群体而言，代际对立具有更强的现实感。图 2 展示了“现役世代与高龄者之间的对立”这一问题在不同年龄层中的回答情况。无论是回答“存在强烈对立”还是“存在一定程度对立”，年龄越低，其比例越高（虽然 30 岁群体的比例略高于 20 多岁群体），而年龄越高则比例越低。如果将“存在强烈对立”与“存在一定程度对立”的回答合并来看，认为存在代际对立的人在 30 岁群体中比例最高，达到 72.0%；其次是 18 至 29 岁群体，占 62.7%。尤其在 30 岁群体中，代际对立已成为继劳资对立与经济对立之后第三位最广泛被认知的社会冲突议题。相比之下，在 70 岁以上群体中，持有这一看法的比例仅为 42.9%。一般而言，这类社会对立的认知往往更容易被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一方所敏感地察觉。因此，年轻群体与高龄群体在代际对立认知上的差异，也可以被理解为年轻群体的不满与高龄群体的相对迟钝之间的差异。

需要补充的是，在社会对立议题中，另一项呈现出明显代际差异的议题是性别对立（“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与代际对立类似，年轻世代更容易感知到这一对立的存在。这可能反映了年轻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社会环境，例如就业的不稳定性以及性别规范的变化等因素。相比之下，其余四种社会对立议题在不同年龄层之间并未呈现出明显差异。

对立当事者意识与世代

在 SMPP 调查中，还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对立之中，您特别将自己视为当事者的对立是哪一种？”调查向受访者提供了前述六种社会对立以及“没有符合的选项”这一选择，并要求仅选择一项。在全体受访者中，回答“没有符合的选项”的人数最多，占 24.2%。这意味着，大约四分之一的选民认为自己并不是任何社会对立的当事者；换言之，也意味着约四分之三的选民认为自己处于某种社会对立关系之中。在六种社会对立中，回答最多的仍然是劳资对立（19.9%），而第二多的是代际对立（17.3%）。尽管从整体认知程度来看，代际对立并不像其他一些对立那样被广泛认为存在，但将自己视为这一对立当事者的选民仍然相当多。

图3 对立当事者意识（按年龄分组）



数据来源：SMPP 调查，2025 年

图3展示了按年龄统计的当事者意识分布。从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回答存在明显差异。劳资对立与经济对立彼此关联性较强，将这两类对立合并来看，其比例在40岁与50岁群体中最高，表明中年群体对经济相关社会对立的意识最为强烈。

另一方面，在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中，最具当事者意识的对立则是代际对立。在18至29岁群体中，占23.1%；在30岁群体中，占21.7%，均为该年龄层中比例最高的对立类型。相比之下，在50岁以上群体中，将自己视为代际对立当事者的比例仅为13%至14%。由此也再次可以看到，代际对立认知在不同世代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此外，在70岁群体中，最具当事者意识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对立，比例达到18.1%。正如从出口民调结果中已经确认的那样，在老龄群体中，传统的保守—自由派对立依然稳固存在，并具有深厚基础，这一点也从当事者意识的分布中得到了印证。与此同时，随着年龄下降，将自己视为意识形态对立当事者的比例逐渐减少，说明这类政治对立在年轻群体中并未广泛形成强烈的认知。

社会对立认知是否决定政党对立

关于社会对立的当事者意识是否与政党对立相联系？在此将介绍对立当事者意识与政党支持之间的交叉统计结果。由于调查中并未包含“在某种对立中，你将自己置于哪一方立场”（例如在代际对立中是现役世代还是高龄者）的问题，因此，即便是拥有当事者意识的人群，也不能被视为一个内部一致的群体。不过，如果当事者意识与政党支持之间存在关联，那么处于不同立场的“当事者”便可能分别支持不同政党，从而呈现出不同于整体政党支持分布的模式。

表 2 展示的是按照不同对立当事者意识划分后计算的政党支持分布交叉表。表中的数值表示，在各类对立的“当事者”群体中，有多少比例的人支持相应政党。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调查是在 2025 年 1 月至 3 月进行的，因此在同年 7 月参议院选举中迅速崛起的参政党在本调查中的支持率相对较低。

表 2 对立当事者意识与政党支持率 (%)

当事者意识	自民党	立宪民主党	日本维新会	国民民主党	公明党	令和新选组	共产党	参政党	无支持政党
代际对立	18.1	7.1	7.9	13.6	4.5	3.4	2.5	0.6	30.2
城乡对立	16.1	8.1	11.3	11.3	4.8	0	6.5	0	30.6
性别对立	14.2	5.3	9.5	8.9	3.2	1.6	4.2	1.1	35.3
劳资对立	19.8	6.9	6.7	6.4	3.7	5.2	1.7	1	35.3
经济对立	23.5	7.3	4.6	6.1	5.2	6.7	3.7	0.3	30.5
意识形态对立	24.3	8.1	5.2	10.5	2.4	7.6	3.3	1.9	22.4
没有符合的选项	22.3	6.9	4.9	4.1	2.4	2.6	1.6	1.2	35.7
合计	20.5	7	6.4	7.8	3.6	4.3	2.7	0.9	32.3

注：未列出八个政党以外的政党，以及“不了解”和无回答选项。将这些被省略的选项计算在内，各项比例横向相加为 100%。

数据来源：SMPP 调查，2025 年。

首先逐一观察各政党的支持情况。通过逐党比较各列数字，并选取数值较高的部分，可以发现：自民党的支持在意识形态对立和经济对立的“当事者”中较高；立宪民主党的支持在意识形态对立和城乡对立的“当事者”中较高；日本维新会在城乡对立的“当事者”中支持率较高，这一点基本符合预期。此外，国民民主党在代际对立的“当事者”之间支持率较高；公明党的支持在经济对立中较高；令和新选组在意识形态对立中支持较高；共产党在城乡对立中支持较多；而在无党派层（无支持政党者）中，则在劳资对立和性别对立的“当事者”之间比例较高。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逐一讨论所有对立类型的情况。就本文关注的代际对立而言，如果将目光集中于拥有这一对立当事者意识的人群，可以发现国民民主党的支持率尤为突出。总体样本中，国民民主党的支持率仅为 7.8%，但在代际对立“当事者”群体中，其支持率高达 13.6%。

众所周知，国民民主党在年轻群体中的支持率较高。另一方面，正如图 3 所示，拥有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的人群也主要集中在年轻世代。因此，也有可能认为，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与国民民主党支持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因果关系，而只是通过年龄这一变量形成的表面相关。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在排除年龄因素影响之后，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是否仍然与国民民主党支持相关，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会随着年龄不同而发生变化。为此采用回归分析进行检验。这里的因变量是对国民民主党的好感度（以 0 至 10 共 11 级评分衡量），自变量包括是否具有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年龄以及两者的交互

项。同时，还将性别、教育程度以及保守—自由派意识形态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⁴。

表 3 展示了回归分析结果。当系数旁标注“*”时，表示该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即可以认为该变量与对国民民主党的好感度存在相关关系。若系数为正值，则意味着属于该类别（或该变量值增加）会提高好感度；若为负值，则意味着降低好感度。

表 3 国民民主党好感度的回归分析)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	1.56**	0.46
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 × 年龄	-0.03**	0.01
年龄	0.02**	0
女性虚拟变量	0.03	0.12
教育程度	0.03	0.13
意识形态：自由派	0.18	0.19
意识形态：中间	0.01	0.19
意识形态：保守	0.70**	0.18
常数项	5.36**	0.28
调整后的 R ²		0.05
N		1474

**：p < .05

数据来源：SMPP 调查，2025 年

首先，从年龄变量来看，呈现出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年龄越低，对国民民主党的好感度越高。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意识形态偏保守者相较于回答“不了解”的群体，对国民民主党的好感度更高。

在此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即便控制了年龄与意识形态等因素，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仍然显著提高了对国民民主党的好感度。进一步来看，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与年龄之间的交互项也呈现出统计显著关系。简单来说，当年龄较低时，拥有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的人对国民民主党的好感度更高；但随着年龄上升，这种影响逐渐减弱（在 50 岁出头时几乎消失），而在高龄群体中，则呈现出相反趋势——拥有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的人反而对国民民主党的好感度更低。这一结果表明，代际对立认知与国民民主党的支持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年轻群体支持国民民主党的形成机制。

⁴ 世代间对立当事者意识，是指将回答自己是世代间对立当事者的人赋值为 1，其他情况赋值为 0 的变量。此外，还将该世代间对立当事者意识变量与年龄的乘积作为交互项纳入模型。性别变量中，女性赋值为 1，男性赋值为 0。教育程度方面，设置一个虚拟变量：若学历高于高中则赋值为 1，高中及以下则赋值为 0。关于意识形态，则根据受访者在“自由主义（0）至保守主义（10）的 11 级尺度上如何定位自己”的问题回答，分别为自由主义（0-4）、中间（5）和保守（6-10）构建虚拟变量，并将其纳入模型分析。

此外，对其他政党的好感度进行同样分析后发现，在立宪民主党、令和新选组以及共产党等左派自由主义政党中，呈现出相反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年轻群体中，如果具有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则对左派自由主义政党的好感度反而下降；而在高龄群体中，这种当事者意识则会提高对这些政党的好感度。至于其他政党的好感度，则与代际对立当事者意识并无显著关系。

政党对立的扭曲与日本政治

本文以世代（或更简单地说年龄层）为切入点，探讨了日本政党政治的现实状况。文章前半部分依据出口民调结果，后半部分则依托舆论调查数据，所呈现的图景是：年轻层、中年层与高龄层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政党对立结构，同时也在感知不同的社会对立。长期以来，以保守与自由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础的政党竞争结构，一直主导着政治家与媒体层面的认知框架。围绕这一框架展开的政治讯息、分析与舆论，对于高龄群体而言是熟悉且容易接受的。然而，由于这种框架与年轻群体对政党对立的理解并不一致，这些讯息往往难以触及年轻选民，甚至可能显得偏离现实或不得要领。更进一步说，年轻群体甚至可能对这种被强加的政治解释框架感到不满和焦躁。

这种不同世代之间政党对立结构的差异，与近年来在选举活动中越来越被强调的代际对立相互交织。随着代际对立认知在年轻群体中的扩散，它也逐渐开始影响政党竞争格局。对代际对立感到不满的年轻选民，往往将支持转向国民民主党，而与立宪民主党、令和新选组、共产党等左派自由主义政党则逐渐拉开距离。由此可见，代际对立并非简单表现为自民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对抗，而更像是一枚楔子，使在野党内部的分裂更加明显。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讨论的仅仅是选民是否“认为社会中存在代际对立”这一认知问题，而并非证明这种对立在现实中必然存在。例如，“银发民主主义（Silver Democracy）”理论所假定的那种高龄群体与年轻群体之间在政策偏好或价值观上的严重冲突，是否真实存在，仍然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就目前而言，这一问题仍未形成稳定一致的学术结论。

然而，即使这种对立在现实中未必如此鲜明，人们仍然可能在各种政治话语中逐渐相信代际对立的存在。例如，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代际财政负担不均衡。但是否认为这种现状合理，实际上是一个个体心理判断的问题，并不必然与“年轻人”或“高龄者”这一身份属性完全一致。将对立结构加以激化并以此动员政治支持，与认真探讨各世代面临的政策问题并加以解决，并不是同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世代之间的连带本身也是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点不应被忽视。

进一步而言，与其他社会对立不同，代际对立具有一个独特特点，即各方立场必然随着时间发生转换。在劳资对立或贫富对立中，人们从一方立场转到另一方立场的情况并不常见；但在代际关系中，今天的高龄者曾经是年轻人，而今天的年轻人也终将成为高龄者。即便将两者视为对立关系，年轻群体当前所追求的利益，也可能与其未来利益之间形成某种时间上的权衡关系。因此，在衡量与调整“现役世代”的不满时，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在多长的时间尺度上理解自身利益。

本文所观察到的这种世代之间“政党对立的扭曲”，并非一时现象，而是与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乃至更早阶段的政治变化相连的长期趋势。它不仅可能对自民党的长期执政构成潜在挑战，也可能成为影响在野党合作前景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因此，在观察未来日本政治时，有必要认识到：日本选民内部存在多条并行的政党对立轴线。即使是一项单一政策，也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对立结构中被赋予不同含义，并通过复杂的政治路径产生多重政治后果。

参考文献

远藤晶久、Willy Jou, 2019, 《意识形态与日本政治》，新泉社。
小熊英二、樋口直人编, 2020, 《日本真的“右倾化”了吗》，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Willy Jou、远藤晶久、竹中佳彦, 《左右意识形态理解的国际比较》，《利维坦》(Leviathan), 2018 年第 63 号, 第 10 - 29 页。

经作者及出版社许可，转载自《世界》2026 年 2 月号，第 21 - 32 页。

远藤晶久

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

1978 年出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投票行为研究与舆论研究。主要著作包括合著《意识形态与日本政治——世代之间不同的“保守”与“革新”》(新泉社), 合编著《无党派选民研究》(有斐阁), 以及英文著作 *Public Behavioural Responses to Policy Making during the Pandem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Mask-Wearing Policies* (Routledge) 等。

